

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青春叙事 及其诗学精神流变

詹玲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叙事经历了从“未然”的童年向“复调”的青春的转型。其青春叙事在后续的不同时期,均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与诗学张力。概言之,分述为三:一,20世纪后20年间,科幻小说积极顺应时代需求与文学主流,着力塑造主体意识鲜明的“新科学青年”形象;随着通俗化与校园风成为消费定位,宏大叙事逐渐退场,90年代不少作家塑造“新科学青年”形象时,更凸显了对纯真情爱的追寻。二,21世纪初至今,科幻小说的成长叙事从主人公学会抗争、感受撕裂之痛,转向习得倾听内心、体悟日常的方法与经验。这一转向反映出作家对科技与人的关系认知,发生了从对立冲突向整体共生转变。三,以“个体性的共同体认同”为身份认同理念的“新科学青年”形象,正成为新一代作家重构个体与家国、世界之间关系的新伦理立场。由上可见,中国科幻的青春叙事不仅敏锐回应了技术社会变迁,更在主体建构、情感模式与伦理立场等思考上持续创新,以其独特的诗意与问题意识,成为观察当代中国文学与时代精神流变的重要窗口,但也存在概念驱动叙事、诗学精神较为单薄等值得反思的问题。

关键词 科幻小说 青春叙事 诗学精神 成长 科技观

作者詹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111)。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6)03-0166-10

青春性是科幻小说与生俱来的文类特性。加拿大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将科幻定义为“认知疏离”的文学,“其必要充分条件是间离和认知的在场及其相互作用”。^①以不断挑战边界、颠覆成见的想象力来推动叙事,以陌生化的文本景观构建来重塑认知,科幻这样的文学特质本身就带有反叛、不成熟和充满活力的青春气息。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为科幻是一种努力突破历史局限、表达乌托邦欲望的文类。这种对“尚未存在”^②之物的渴望与描绘,亦显示了科幻面向未来、充满希望的青春姿态。中国科幻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起,更是以告别科普童年的姿态,用充满人文魅力与现代性冲动的“新科学青年”形象,开启了激情与感伤并存的青春时代。时至今日,中国科幻小说已然立足于科技与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书写了青春的不同面向。与日俱新的青年作家及其作品,不仅张扬着科幻的青春性格,诠释了科幻的青春精神,散发出成长的诗意气质,而且鲜亮了新世纪文坛,成为其中备受瞩目的新星力量。

考察中国科幻小说的青春叙事及其诗学精神流变,既是把握中国科幻小说叙事转型流变,进而研究中国科幻发展现状及未来可能的重要进路,也是立足当代中国文学的青春叙事视野,审视科幻之于当代文学,尤

^①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②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

其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价值启示的有效途径。基于此，本文拟以梳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青春叙事为基础，聚焦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二十余年的发展历史，撷取典型个案展开文本细读，兼及散点透视及现象整理，探讨作家们如何不约而同地将青春成长这样的个体生存经验置于超现实的时空想象之中，建构起具有新技术社会症候的“新人”形象及青春诗学精神，触摸和把握现实脉搏，回应时代变革。

从“未然”到“复调”：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幻小说青春叙事的形态转变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青春叙事多与民族国家复兴、现代性起步的宏大话语关联一体，科幻小说亦然。与主流文学往往将个人的成长作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变革符号，展开关联性隐喻的青春叙事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幻小说里，青春的国与青春的人，绝大多数是作家们站在科技现代性的起点眺望的乌托邦愿景。《到人造月亮上去》《割掉鼻子的大象》《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等诸多作品，无一不是用大睁着的好奇双眼，参观天文奇景与丰产奇观，畅谈理想的未来接班人形象，以及超速、超力与超量的未来技术景观，投射出位于历史延长线之前端的青春影像。未来那个必然来临的活力盛世，让新中国的科幻小说充满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激情。它恒定了将来的“未然”样态，同时也形塑出彼时烂漫、天真的童年情状。当然，“十七年”科幻小说也并非没有青春叙事。郑文光的《火星建设者》就是极为难得的一部。小说采取回忆性叙事，借用主人公薛印青之口，讲述火星开发初期，各国青年科学工作者齐聚火星太阳谷，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成功建设起人类工程基地。尽管作家甚少着墨建设者个体的青春形象，但是“建设者的歌声和笑声”、礼堂里“青年人的翩翩起舞”“急促而轻快地跳动”的生活旋律，还有田野里茁壮长出的“一望无际的天蓝色的麦子嫩苗”，不断铺展开去的“新的城镇”^①，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整体有着蓬勃感和明朗色调的青春图景。

1978年，兼具中国科学院院长和著名作家双重身份的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题为《科学的春天》的讲话。感受到拂面春风的不只科技工作者，还有科幻作家们。在郑文光、金涛、童恩正等“姓文派”作家的笔下，最能表现这股春天气息的，当数那些鲜活的，散发着青春生命力的“新科学青年”。或许是因为在“十七年”时期积累了一定的创作经验，郑文光在80年代初的科幻青春叙事写得格外得心应手，成就也最为突出。《飞向人马座》《大洋深处》《太平洋人》以及《神翼》等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十七八岁或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女。他们或被意外抛入太空，在茫茫宇宙中挣扎自救，或为寻父潜入深海，想尽各种手段摆脱囚禁困境，或不畏险阻，勇于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在求生或追寻真相的过程中，这些青年不仅学习了科学知识，锻炼了意志，敏锐了头脑，彼此还结下了深厚友谊，收获了美好的爱情。不同于《火星建设者》中面目不清的青年群像，上述作品里的青年主人公形象更加立体生动，人物成长过程的性格转变也清晰很多。《飞向人马座》里的邵继恩、邵继来兄妹，一个沉稳坚强，一个活泼单纯，《大洋深处》里的庾新翎和庾新翊，则都冷静内敛，与另一位主人公皇甫堤的聪敏灵活形成了鲜明对比。《神翼》里的冯丹青，从刚开始丢了飞行衣时的急躁、莽撞，到追查过程中遭遇各种困难，逐渐变得“能思考，有了更深沉的气度”^②，呈现明显的成长轨迹。除了郑文光，成功塑造个性鲜明的科学青年形象的，还有童恩正的《追踪恐龙的人》、金涛的《月光岛》、任志勇的《大洋深处的城堡》以及周永年等的《最后一个癌症死者》等多部小说。

细梳这些作品，便会发现作家们往往借助两种手段提升文本的故事性，突破“十七年”科幻儿童科普的创作模式。一是延续“十七年”青春文学的主题，即将个人的青春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建设事业紧密捆绑，通过青年主人公的逆境求生、真相求索，体现主人公性格、价值观或世界观的成长，如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大洋深处》《追踪恐龙的人》等；或以主人公与敌特分子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为叙事主线，讴歌其激昂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奉献品质，如金涛的《月光岛》、施鹤群等的《海底魔影》、顾再欣的《灵犀》等。二是将青年科学家求真、求索的科学精神与感人的师生情谊、跌宕的实验室爱情或亲情缠绕一体，如王晓达的《无中生有》、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这既回应了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及知识分子力量的时代政治诉求，又合流了张扬人性人情的思想主潮，丰满了人物的血肉。经由这样的叙事

① 郑文光：《火星建设者》，《中国青年》1957年第22—23期。

② 郑文光：《神翼》，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变革,上述科幻小说既承继了鲁迅、梁启超开启的,科学小说应“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①的科学教育功能,又将科普重点从科学知识原理转向科学精神素养。更重要的是,科学新人形象的塑造,让科幻小说成功地进入了新时期文学“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建构的话语场域,成为历史转折时期文坛探索新人主体性的重要支脉。这些作品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科幻小说逐渐走出纯真、清澈的童年,进入激情与感伤并存、无所顾忌与患得患失同现的复调青春时代。

80年代中后期,虽然由于“姓文派”的没落以及科幻期刊在改制风潮下纷纷停刊等因素,科幻小说数量骤降,青春叙事也随之减少,但依然有吴显奎的《美丽的哀牢山》《勇士号冲向台风》、童恩正的《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等延续此前叙事模式的优秀作品出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除了少量作品如凌晨的《天隼》、王晋康的《太空雕像》《三色世界》等外,科幻小说的青春叙事开始发生系列转变。概而言之,表现为宏大叙事的退场、国族情怀的减弱以及情感叙事比重的提升。90年代前期,情爱叙事占了很大比例。譬如谭力等的《太空修道院》里,丹扬和同伴驾驶飞船飞向小行星带,不是为祖国人民进行太空科学探索,而是要做一回姑娘们眼中的“漂流勇士”。男孩子们如何打破太空修道院的清规戒律,让修女们看到“这世界用感情的珠玉嵌成”^②,成为故事行进的情节主线;星河的《众里寻她千百度》通过为骗取技术机密用美色诱惑“我”的梅玫,与为爱不惜一切代价救“我”的马薇玮之间的对比,强调真情的可贵。韩建国的《瞬间前后》里,肖雨驾驶飞碟穿越时空,目睹了昔日抛弃自己的恋人赵亚兰的婚姻不幸,并与赵亚兰的女儿相恋,可谓情感复仇类的“爽”文。90年代中后期,一些作家尝试将故事的情感主题从情爱拓展至友情、亲情,并延伸至社会规则、生存意义等的思考和领悟。譬如苏学军的《远古的星辰》里,楚国男孩赤比用“古人特有的义气与朴实”^③,让火星来的试管男孩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友情与人性温暖,毅然决定用个人的牺牲换取地球未来的和平。赵海虹的《桦树的眼睛》以陈平追查好友素素死亡真相为故事主线,在揭开悬案谜底的那一刻,女孩洞悉了人性的黑暗,也完成了青春的成长。类似的作品还有苏学军的《火星尘暴》、韩非的《血染星图》、李学武的《梦境》等。

为什么这一时期科幻小说的青春叙事会发生这样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之后,科幻小说创作继续沿着偏向主流文学和回到儿童科普这样的两个方向发展。偏向主流文学的科幻作家们,一方面跟随时代文学环境的大趋势,将注意力移开政治,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另一方面,又因彼时全国仅剩一家科幻刊物《科学文艺》(后改名为《奇谈》《科幻世界》)刊发文学色彩浓厚的科幻小说,创作不得不深受其办刊导向影响和制约。《科学文艺》为了刊物的生存,在不同时期分别探索了通俗化与校园风等创作路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能看到的80年代后期的科幻小说,多没有“内转”到先锋、现代派等较前卫的叙事形式探索,而是转向通俗;90年代的文学整体沉降到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后,科幻创作除了同步出现反思、批判欲望的科幻现实主义想象外,又延续80年代初郑文光的科幻新人形象塑造模式,发展出了一条强调友情、勇气、智慧、责任等青少年价值观的青春科幻新路。90年代,《科幻世界》将读者对象定位为大中學生群体,并有意识地着力培养校园作家。何夕、赵海虹、陈楸帆、杨平、潘海天、程婧波等至今依旧活跃在科幻文坛的优秀作家,都是90年代读书期间便得益于《科幻世界》的平台扶持,开始创作和发表科幻小说的。这些作家作品在人情人性的书写方面既可见出启蒙文学思潮的影响,又因其自带的青春气息与理想色彩,纵使涉及爱欲情感叙事,相较主流文学亦显得更为纯净和浪漫。也正是这些校园青春科幻叙事,让科幻小说在主流文学步入中年的时刻,于文坛的边缘圈出了一块青春的自留地。

从科技乐观主义到技术批判反思：撕裂的成长之痛与抗争的少年英雄

进入21世纪,中国科幻小说迎来新一轮的创作繁荣。不同于此前的数次浪潮,这次繁荣恰值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新科技革命又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与科技的腾飞,给了中国

①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② 谭力等:《太空修道院》,《科幻世界》1991年第1期。

③ 苏学军:《远古的星辰》,《科幻世界》1995年第4期。

科幻文学发展前所未有的自信力。社会政治的持续稳定，也让中国科幻作家第一次拥有足够充分的时间与空间，来持续观察、思考科技与社会、人之间的关系，想象未来或平行宇宙的多重可能。《科幻世界》之于中国科幻创作的持续影响以及青年科幻作家频出、迭代迅速等因素，使得青春叙事在这二十余年的科幻小说创作里，依旧是十分亮眼的存在。对比之前的科幻青春叙事，其最明显的变化在于，不少作家开始以主人公的青春成长蜕变为叙事手段，隐喻创作主体及其同时代人遭遇的技术时代变革，并重新审视和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

何夕的《伤心者》是21世纪初颇值关注的典型文本。小说用跨越时空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数学系研究生何夕为了钻研“微连续理论”，失去了爱情，忽略了亲情，最终在穷困潦倒和精神失常中走向死亡的故事。何夕在弥留之际喊出的两声“妈妈”，以及时空旅行的旁观者目睹何夕母亲任劳任怨，为儿子全身心付出时发出的唏嘘，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青春之殇与成长之悔，弥漫于文本的字里行间。可以想见，如果时光可以重来，何夕很可能不会再一头扎进书本，而是选择好好陪伴母亲。这或许是中国科幻小说第一次如此明确、清晰地将个人情感凌驾于科学研究之上。尤其是将情感对象设定为母与子，无疑一下子击中了有着数千年中华孝悌文化传统的中国读者的情感软肋，造成的撕裂性疼痛不言而喻。^① 在分析小说叙事冲突形成的强大美学张力的同时，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作家会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将科技与人性、人情对立起来？

20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批判、反思现代科技的叙事数量很少，且多出现于后20年间。若细读这些作品，如王术等的《碧海桃源》、海子的《遥远的记忆》、任佳音的《波尼家的一天》、刘兴诗的《天空的逃亡者》等，便会发现这些小说想象的恶托邦未来，有着明显模仿西方科幻的痕迹。原因概为以下两点。第一，20世纪的中国处于工业现代性起步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科技发展的两百余年里出现的诸多问题，在中国直至20世纪的后20年才有些许表现^②，且并未深度影响社会多数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此外，“四个现代化”“科技强国”的政策引导、驱动，也让多数科幻作家们对人类驾驭科技的能力充满信心，创作时也更倾向于表现科技发展的光明面向。第二，中国科幻小说长期以来承担着向民众，尤其是少年儿童普及科技知识、培植科学精神的教育使命，在读者科学素养不足以支撑批判性思考的情况下，过于强调科技现代性的弊端，反而会影响到读者形成正确、客观的科技价值观。如果说西方科幻作品中的恶托邦主题，往往源自启蒙人文主义对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现代性发展引发资本极权、人性异化以及生态恶化等诸多社会现实弊病的警惕与担忧，那么20世纪后20年里，中国科幻作品出现的同类主题则更偏向一种远未来的想象。作家们或对中国科技与经济的粗放式发展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所觉察，但未能也不愿深究细里，而是将之作为一点因由，以此寻找、学习同类西方科幻创作的叙事模式，进一步深化人道主义思考。

情况在21世纪初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科技发展此时进入新一轮加速期。重化工产业高速扩张，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兴科技快速迭代发展。科技推动经济持续飞跃的同时，与资源环境、社会安全等的矛盾也随之更加凸显。政府对待科技现代性的态度，从之前的技术工具化、效率优先，开始转变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③：一方面，科技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亟需文学给予积极的回应，另一方面，处于代际转换过程中，且以青年为主的科幻作家群体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对科技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发展”的未来，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和思考。但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使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世界视野。西方科幻小说家们常借助的理论思想，如马丁·海德格尔、赫伯特·马尔库塞、刘易斯·芒福德等人将科技与人二元对立，反思科技造成的人性异化、社会极权、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传统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理论；以及常使用的叙事手段，如人类

① 《伤心者》发表当年，以压倒性优势获得第十五届中国科幻银河奖。读者将主人公评为“史上最惨科幻小说主人公”，纷纷表示“看了《伤心者》，不哭的话”是不正常的。参见中国科普作家网《伤心者》介绍栏，<https://www.kpcswa.org.cn/web/press/members/021430W2019.html>。

②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祝光耀在《21世纪初中国的环境形势与对策》（2001年）一文中指出，中国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因此也出现一些环境问题，且“局部地区的环境问题还较为突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世界政要和名人谈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17页。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4页。

反抗机器人、仿生人、基因武器等技术物的斗争叙事，也都成了这些青年中国科幻作家们探讨中国科技现代性问题，推演、想象中国科技社会可能性未来的“称手工具”。

不过，将科幻想象建立在科技与人二元对立的科技观的基础之上，对于彼时的中国青年科幻小说家而言，并非易事。70、80 后作家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头 20 年里中国科幻创作的主体力量。他们的少儿时代正好历经“四个现代化”的改革浪潮。并且，从阅读经历来看，除了西方科幻小说，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新时期科幻大家的作品，也是其童年汲取的重要精神营养。^① 因此，当这些作家在 21 世纪初想象科技与人二元对立的恶托邦未来时，或许首先要做的，是与少年时期的经验，尤其是其中的科技乐观主义思想做切割。于是，撕裂式的青春成长叙事成为他们最偏爱的叙事模式之一。毕竟只有这样，作家们才能将那种价值冲突与观念再造的阵痛投射到主人公的身上，借助主人公的成长来完成自身的成长。《伤心者》正是如此。当作家将主人公痛失母爱的悔恨之源，指向其青春时代投身科学研究的激情时，他通过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置于冲突两极，并高扬后者旗帜的叙事姿态，告别了那个为科学献身的价值传统。此外，迟卉的《归者无路》里向往自由，却被网络里的渊隐吞噬了意识，换了躯壳无法与母亲相认的程雯、夏雪蛟、吉兹娜们，《2030：终点镇》里长大后终于认清了被人工智能操控的小镇真相的凯玲，张冉的《起风之城》里在女伴的引导下，与其合力反抗被技术资本垄断的不公世界的少年“我”等人物，都是经历成长之痛后，方坚定了与技术抗争到底的信念。这类小说中冲突性最强、撕裂感最烈的，当数陈楸帆的《荒潮》。主人公小米在技术资本、地方势力等的多重压迫下，于濒死之时进化出强大的赛博人格，领导民众反抗暴力与资本剥削，却又用人性、爱与平等进行自我斗争，打败了赛博理性的小米。太过剧烈的灵魂撕扯，让小米陷入如白痴般的空茫状态。而这，又未尝不是作家自己立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前的精神写照。

当作家们用小说里的青少年形象作为自画像，想象科技与人的对立、冲突时，虽然许多作品都弥漫着孤独、感伤的成长情绪，但像《伤心者》《归者无路》《2030：终点镇》那样比较消极、悲观的，还是少数。不少作品里，主人公或通过持之以恒的探索、研究，或用顽强的斗争意志与拼搏精神，战胜超级机器、技术资本霸权，保卫世界和人类的安全与和平。譬如冯原的《基因源》里，男孩上官洛和欧阳完为消除基因优化造成的阶级分化，在各自的领域拼尽全力；镇魂歌的《睡者的荒原》里，大学生任沂为拯救灾难中的世界，用自己的意识屏蔽了电子精灵奥斯波特，陷入了永久的沉睡；水妖精的《灰色的忧伤》里，歌夜、萧灵为解决纳米机械无限繁殖造成的人类灾难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类似的还有《荒潮》、黄曼远的《天空之上的深海》、赵海虹的《世界》等等。

这样的叙事模式有着明显的美国青少年通俗科幻影响，即想象青少年主人公与象征技术异化的敌对势力抗争，在为人类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完成个人的主体性建构，成为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不过，作家除了彰显主人公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气质外，鲜有像美国青少年科幻那样，把认识到自我的与众不同，转化为抵抗外敌的力量，作为成长叙事的主线。大多数主人公都与前述的《归者无路》《起风之城》等的主人公并无二致：或从一开始就被抛入技术资本社会的狂澜里碾压，成长的过程就是积累反抗力量的过程；或将认知科技的阴暗面作为成长的断裂点，在过去自我的消亡中实现重生。而这样的成长叙事里，主人公及其自我成长的经历往往不过是作家表达科技观念转变的叙事工具一种。或许也正因此，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形象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大多不够鲜明、立体和生动。此外，还需指出的是，文本中那种依靠极致放大主体意识或道德意志力来战胜技术强力的想象，没能超越传统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思维，反因过于理想化而沦为了一种空想。

内心化、整体性与日常态：近年来科幻小说成长叙事的新变三种

近些年来，中国科幻作家群体开始历经新一轮的代际更迭：刘慈欣、韩松、何夕等 60、70 后科幻作家的

① 何夕、宝树、江波等作家都谈到过自己童年十分喜爱阅读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作家作品，深受小说里的科技乐观主义影响。参见任一江等：《中国新科幻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3 年；《宝树访谈：科幻内核是生命的真实体验》，江玉琴等编：《中国当代科幻作家访谈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江波：《与同仁一起，走出科幻之路》，《科普时报》2025 年 2 月 14 日。

创作数量不断减少，陈楸帆、宝树、迟卉、顾适、双翅目等80后作家持续发力，加之昼温、海漉、路航、齐然、天瑞说符、杨晚晴、王诺诺等多位优秀90后作家作品亮相文坛，以80、90后作家为主力的新创作阵势已然形成。新科技、新时代与不断补充进来的新鲜血液，共同塑造了中国科幻文坛相比以往更新鲜、更富青春活力的创作面貌。

对科技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作为科幻小说创作最核心的主题，依然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随着改变“原子”世界的生物技术与改变“比特”世界的信息技术融合式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类的生存方式、对生命存在的认识以及日常生活环境等等，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革。^①如果说社会生活让科幻创作面临了新的挑战，那么理论研究领域的新动向则为其增添了新的思考路径。唐娜·哈拉维、罗西·布拉伊多蒂和凯瑟琳·海勒等后人类主义学者及其理论观点在中国学界的影响日趋广泛和深远，也让不少科幻作家们开始意识到，理解AI、增强现实、生物技术和人机互动等新型技术，提倡去人类中心化，强调人类与技术的本质性纠缠和共生关系的后人类主义理论，或许比“工具论”或“替代论”等理论能够提供更丰富、深刻，也更合理、积极的认知框架。此外，中国政府的科技发展态度业已十分明确，即以文明存续为目标，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动数字—生态协同共进，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制造等技术持续向绿色化、智能化的方向迈进。此上种种，都使得一些敏锐的青年作家重新审视和理解科技与人的关系，并将这些新的思考付诸科幻想象。而这，也决定了成长叙事再度成为他们惯常使用的重要叙事策略。

对比此一时期与之前的成长叙事，虽然作家们都是以主人公历经的某些事件作为故事的引擎和枢纽，将科技观的改变和重塑作为主人公身心走向成熟的标志，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首先，抛却而非确立科技与人对立冲突，强调人与技术的互构共生，将人与技术纳入整体视域展开观照，是当下青年作家通过成长叙事，建立起的新价值立场；其次，相比之前主人公在遭遇科学信念坍塌、个人与垄断技术资本对抗等宏大叙事与极致抗争中，实现重生式成长，

近年来的成长叙事多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与技术、技术物相处的经验积累、感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式成长。因此，在场景的审美张力、人物情感以及叙事语调的处理上，后者总体都要温和得多。接下来，本文拟结合具体作家作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详细探讨。

其一，一些作品将视角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物内心，以自我的觉知，即认知、明晰且遵从内心需求作为成长的标识，由此凸显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构建出一种与技术物共存的新主体意识。陈楸帆的《云爱人》细致描绘了主人公曾零星从一开始以对抗性的姿态面对AI，到爱上AI“气球心先生”，怀疑自己的异化与堕落，再到宁愿输掉游戏也想要保全她的AI爱人不被清零的心路变化历程。作家用女孩的情感波折及其背后的爱情观念转变，传递出他对于人类情感以及人机关系的重新认知，“也许爱情本身就是被文化慢慢建构起来的一个东西，是能够通过学习去模仿的”，机器“能够给你爱的感觉，就足够了”。^②杨晚晴的《玩偶之家》里，因车祸失明的安妮安装了机器共生体泰迪重获光明。从婚前下定决心与泰迪切断情感关联，到渐渐发现它不止是个机器，更是自己的“一片灵魂”^③，进而选择与泰迪再度共生。安妮看似重新倚赖机器的行为，实则体现了她对自我需求的清醒认知和自主选择。类似的故事，还有路航的《心语者》、陈楸帆的《双雀》、杨晚晴的《金桃》以及李夏的《长安风轮记》等等。在这些故事里，作家并未回避技术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例如虚拟的情感镜像、过度倚赖智能物所导致的主体让渡等等，但也没有对其采取简单批判的立场，而是把它们看作人物主动做出并愿意承担相应后果的选择。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疑对既有的，以具身性为边界的人的主体性提出了新的质疑和思考。

其二，少数作家尝试将技术物视作世界万物之一，进而将人技关系纳入“人与物”“人与世界”的关系框架中予以观照。由此，对技术物的认知不再是遭遇外在的、陌生的“他者”而产生的差异性碰撞，而是对身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和再认识。这种视角的转变，使得创伤与撕裂也就不必要成为主人公实现顿悟和成

① 参见秦铮：《全球科技发展与创新格局前瞻》，《瞭望》2025年第8期。

② 陈楸帆：《“超真实”时代的科幻文学创作》，《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

③ 杨晚晴：《玩偶之家》，《归来之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59页。

长的必经阶段。以双翅目的《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为例。主人公制作、修复毛颖笔，跟着它探索更隐秘的世界，“于心灵版图之外，瞧见上帝普照之外的自然”^①。从一开始，主人公由着自己的本性，保持与毛颖笔之间的边界，到之后他在与毛颖笔一起游历的过程中，逐渐悟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关系，方为他这样的人类与毛颖笔相处的应有之道，主人公的成长由多个“微顿悟”时刻累积而成。相比此前创伤性成长叙事里，那些撕裂过去的伤痕式顿悟，这样的非创伤性体知，或许不够强烈和戏剧性，但更安静、微妙和丰富，且同样深刻。此外，“物物而不物于物”这一有着传统道家“无为”与“逍遥”思想渊源的人技关系，彰显出人之于技术、技术物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关系架构，使得小说主人公的青春成长，不同于被迫卷入技术资本狂澜的故事人物那样孤独、紧张，强行膨胀起自我意志与技术强权斗争，而是一场温和、自由，充满诗意的奇妙旅程。类似的作品还有王诺诺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靛灵的《纸闭》、苏莞雯的《龙的呼吸阀》等。

其三，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取代星系战争、种族冲突等“例外”事件，成为作家们铺展技术想象的主体场域。这使得小说叙事得以放缓节奏，由细节、情绪和氛围的积累推动故事行进。技术与技术物也得以作为生活的有机组成，参与着日常审美艺术的新内涵建构。杨晚晴的《麦浪》里，一碗散发着真正麦香的面，让安娜在漫长的冬眠醒来后，终于理解了麦思远在充斥着人工合成食品的生态灾难时代，执着于农耕技术研发的意义。同样，路航的《鸚鵡不鸣》里，为了让太爷尝到失传的鸚鵡红酒，方君突破了自我设限，从科研受挫的瓶颈中重新振作起来，培育出水质净化菌，复原了太爷当年酿制的味道。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对亲人、爱人深沉而坚韧的爱，以及食物所映照的生命本性，共同诠释着“人何以为人”的深刻命题。昼温的《泉下之城》里，一心想飞向外星球的“我”回到泉城，看到进化为智慧生命的纳米亲水机器人百脉如何熨帖地全方位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为他们创建可以缓解内脏和骨骼负担的微重力环境，决定留在故乡接替父亲，担负起守城人的使命。通过放大感官体验而非制造陌生化的奇观，上述作品让技术与技术物在传统的单纯冷硬、阳刚的美学质感之外，因混合了人体温度、情感波动和文化伦理而透出柔软、温暖的新质地，帮助着人类更深入地重新审思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总体而言，科幻小说青春成长叙事的以上三点变化表明，一些青年作家们对于人技关系的思考以及科技想象，正逐渐从远未来折返现实的象征化、寓言性写作，转向将近未来视为现实的有机构成。他们通过先行一步地描绘现实可能发生的形变，捕捉并反映奔跑向前的技术社会现实。经由这样的转向，作家得以摆脱以技术批判理论为先导的创作范式，转而将技术与技术物安置在人的世界里，从实然的层面观察并书写人在日常生活中习得新技术、遭遇新的技术物时产生的经验感受。这些经验感受作为作家笔下主人公认知世界的成长经历，所呈现的不仅是人对技术、技术物的认知，更延伸至人对于自我，还有对于周遭世界的深层认知。此外，将成长叙事聚焦于青年主人公的日常瞬间，呈现人物如何于平凡、微末的生活中，经由眼、耳、鼻、舌、身等感官细节咂摸，逐渐重新发现和接纳身边的一切，这种琐碎的深刻产生的，是最贴近我们真实生命的叙事，以及最富有生命光泽的诗意。

个体性的共同体认同：青年作家笔下科学新人形象及其新伦理立场

前已有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由于作家们的创作更多地偏向情感主题或强调科技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80年代前期郑文光等人笔下那种专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且无私奉献的科学新人形象有所减少。纯粹的科学主义者形象明显增加，既出现了不少类似弗兰肯斯坦、莫罗博士等西方科幻小说中的疯狂科学家的人物，如王晋康的《科学狂人之死》里的胡狼、何夕的《十亿年后的来客》里的雷恩教授；也有将科学视为一种“道”般的存在，以士志于道的精神哲学来求索漫漫科学之路的科学家，如刘慈欣的《朝闻道》里的丁仪、长铗《昔日玫瑰》里的海帕迪娅等。作家通过刻画这些人物，表达其对于科技或乐观或批判的态度，并以此凸显小说主旨。不过近些年来，相关创作情况有所改变。为了集体利益而钻研不息的科学新人形象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青年作家作品中。

概而观之，不难发现许多作品承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辈作品中科学家形象所蕴含的科学理想主义

^① 双翅目：《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花城》2022年第5期。

精神和无畏的探索勇气，但作家更强调人物对科学的热爱源于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其奉献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譬如齐然的《飞跃松花江》里，主人公张帆主动要求弹射出舱，通过救生小艇引开厄运星。人们都感佩张帆的自我牺牲精神时，他却强调这样的举动不过是在实现他自己迈向更深星空的毕生梦想；江波的《命悬一线》通过“我”和美国宇航员莫里斯、普拉斯等人在太空遇险时，不约而同地选择舍身相救同伴的故事，诠释了“太空里并没有真正的国界，所有在太空里行走的人，都是人类的英雄”^①的深切内涵；昼温的《星海言灯》里，“我”的姐姐为了保护正在消亡的语言，用开天斧和惜字塔两个行星改造系统将她的大脑，连同她收集到的全新赫尔辛基语料库一起，镌刻在格里姆星的地质环境中。类似的人物，还有顾适的《为了生命的诗与远方》里的“我”和师姐莫晓然，谢云宁的《遥远的脉冲微光》里的雷川，段子期的《宇宙不在场》里的吴集、陆云舸等。

另一些科幻小说家如海澱、梁清散等，尝试将历史时空作为叙事场域，重新发掘并塑造了不少具有科学报国热忱和民族气节的青年新人形象。海澱的创作多为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故事新编”。《江之怒》重述的是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丁文江（故事人物名为丁文昌）的故事。作家只取其调查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的一点历史因由，敷以极富创造力的想象，如勘察江底大洞并将之改造为超级大炮，成功炸毁日军生化武器基地等，使一位学养深厚、敏思笃行的爱国科学家形象跃然纸上。《龙骸》则在晚清科学家谢缙泰设计飞艇的真实历史基础上，想象其如何成功造出“中国号”飞艇并驾驶飞艇击落外敌；《走蛟》取材安西大都护郭昕率领残部死守龟兹、与吐蕃军浴血奋战的悲壮历史，虚构其与波斯女孩的爱情纠葛、研制“飞舟”等情节，赋予了这位民族英雄求真求索的科学精神和人性温度。

相形之下，梁清散似乎更热衷于在历史的帷幕之下演出一场场普通科学青年的理想悲剧。“新新日报馆”系列以记者梁启和侠客发明家谭四的探案为主线，牵出希冀以真才实学实现实业救国理想，却被现实打败的“归国四杰”的故事。影子幼童的身份，暗示了这些科学青年不被历史知晓的平凡命运。类似的还有《沉默的永和轮》里，在掌事者和工匠们的排挤打压下携手为科学理想献出一切，最终双双殒命的杨继和孟指然；《济南的风筝》里一心想造出扑翼飞行器，后在爆炸事故中丧生的陈海宁；以及《枯苇余春》用科学肢解、重组小说以升华小说艺术美学，但被杀害抛尸的唐李寒等等。这些人都胸怀科学理想和超前志趣，企图为解决救亡图存的家国危机做出一番大事业，却无一例外地以死于非命结局。

不论海澱以青史留名的英雄人物及其生平故事为想象的生发之源，还是梁清散搭建真实可感的历史场域，并于其中虚构普通青年难以实现科技梦想的悲剧，我们都能看到他们亦努力赓续着新时期初科幻小说的科学新人形象塑造传统，即将科学与救国再度联系起来，在张扬青年主人公科学探索精神的同时，浓墨重彩地刻绘其爱国为民的理想和情怀。不同的是，相较于郑文光、童恩正等人笔下那些在各种变故或事件中成长的青少年，海澱和梁清散作品里的科学青年们从一出场就有着鲜明的主体性和人格特征，加之他们或慷慨悲壮，或凄然沉重的科学救国故事，使得作品的叙事主调并非明媚活泼，而是透出历史的厚重与苍凉。

这两类科学新人形象在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中的出现绝非偶然。首先，中国政府将科技发展视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把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崇尚科学和鼓励创新的风尚”（《“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这些政策与举措，为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提供了明晰的价值方向和实践导引。其次，科幻小说作为新科技时代的文学先锋，正在担负起塑造具有代表性的时代新人的文学使命。如有论者指出的，当下中国文学中的“新人物”，“不是文学史画廊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也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新人’。而是那些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能够构成同构关系的青年人物形象”^②。相对丰裕的物质基础与互联网的普及、社会媒体的兴起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当代青年个体“逐渐形成了更高的存在感与价值自觉”，建立起“‘己’与‘世’相对独立且平等的原则”^③。想象的

① 江波：《命悬一线》，《科幻世界》2022年第1期。

② 孟繁：《历史、传统与文学新人物——关于青年文学形象的思考》，《文艺争鸣》2020年第2期。

③ 桂勇、刘紫川：《原子化社会中青年社会联结的逻辑、形态与表征》，《青年探索》2025年第5期。

共同体“被青年人视为自己身份外展的一个巨大投影，它既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强大集体，又是一种与个体平等化的人格性存在”。上述科幻小说里科学青年们承担救援、救亡等各类使命，表现出的强烈的共同体认同，并非让自己成为嵌入集体的无名螺丝钉，而是传递出“个体性的共同体主义”这一新的伦理价值立场。而这，正是当下青年以自身为核心，将想象中的共同体作为“孤独个体与强大集体相联系的中间场域”^①的时代心理映照。

这些科学新人身上积极的科学探索精神、鲜明的主体性意识和勇于投身高科技未来发展等精神特征，同时也符合了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双重需求。从主流价值观中以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集体认同来看，基于历史重述和未来想象两个时空位面塑造的两种科学新人，分别契合着不同的共同体价值维度。他们不仅与新时期初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新人，也与 20 世纪主流文学里的科学新人，如草明《乘风破浪》里的李少祥、艾芜《百炼成钢》里的秦德贵等有着高度责任感和科技创新精神的青年技术工人，以及徐迟《哥德巴赫猜想》里的陈景润，《第二次握手》里的苏冠兰、丁洁琼等青年科学家形象，连缀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科学新人形象长廊。它让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新人其实一直是文学新人形象的有机组成。只不过上述科幻小说里的科学新人，其现实意义已超越了具备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的新人范畴，成为当代青年群体形象的折射符号一种。

还需指出的是，一些青年科幻作家不仅通过塑造这些科学新人形象，呈现时代青年群体的文化性格，更将视野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汲取现有文学的优秀叙事资源，探索和构建新科技社会的其他新人形象。E 伯爵的《这班不上也罢》里，刚进十字星边检站工作的奈科斯星人哈斯塔作为一名新人，其积极处理工作事务的满腔热情，遭遇上司罗曼诺夫部长“平衡原则”的冷处理，以及与其搭档何珊迪，一名如大姐姐般的地球女孩之间的对话交流等情节，俨然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科幻翻版，又折射出当下职场年轻人正在遭遇的现实问题。廖舒波的《火星绮梦》学习汪曾祺式理性控制的叙事手法，用细小的碎片想象，展现了徐冰、柳韵、刘芸等身处超科技时代的新人“平凡生活的诗意”。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齐然的《白日梦蓝》则分别借用影视剧《触不到的恋人》和《漫长的季节》的核心叙事框架，又通过男女主人公跨越时空，携手合作以解决危机/探索真相的科幻想象，极致化浪漫爱情的诗学张力，同时建构起具有丰富的主体性和新身份认同理念的理想新人形象。

总体而言，对比此前的科幻小说创作，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出现的上述新青春叙事，在青年形象的塑造、科技与人的关系思考以及叙事技巧的使用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首先，不少作家笔下的科学青年主人公，在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集体关系的认知与处理上，均表现出更加积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或是在人物的青春成长中逐渐摸索、转变而形成，或一开始就是作为形象的底色存在。不论哪种，作家都会不自觉地强调，这些年轻人放弃既有成见，接受技术的改造与共生，或与他者合作以突破困境、探索真相或救民于水火的行为，均是出于主人公的自我价值抉择。

开放、包容的态度本身也意味着个人主体性的成熟。作家因此跳脱出了 20 世纪青春文学惯有的叙事立场，建构起从自我主体的角度出发审视世界，并发展出共同体意识的新成长叙事与新青年形象，以及新的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模式：双向互构。这样的青春叙事，其价值意义不仅在于真切地反映出时代青年的文化性格，而且作为科幻想象，为科技与人的关系问题、文学在新科技时代的人学问题等等，都提供了新的思考。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作家强调个体强大的自我意志与可协作、值得认同的共同体，让人在高速发展的科技面前有了新的自信。相比 20 世纪中国不少科幻小说里，主人公的科技热情与自信往往来自现代科技社会未曾到来的理想与憧憬，这种因人的力量而产生的自信，更坚实也更坦然。二，这些青春叙事不仅赓续又发展了中国文学的集体主义精神传统，赋予其以更符合时代需求的价值内涵，而且与世界科幻中的“希望朋克”（Hope Punk）形成了对话与交流，即都主张友善、包容以及人的力量的联结，关注生长、更新的潜能，以抵御恶托邦的虚无与绝望情绪。这种积极、正面的态度，让理性认知充满了人文关怀，使科技探索拥有了人性的温度。其次，作家们除了像以往那样向西方科幻借鉴叙事技巧外，也开始认真学习新中国文学以及通俗文

① 桂勇、刘紫川：《原子化社会中青年社会联结的逻辑、形态与表征》，《青年探索》2025 年第 5 期。

艺的优秀叙事方法。这不仅使得科幻的青春叙事在叙事节奏、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情节结构编织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升，而且与多方文学的积极沟通、对话，也让科幻小说成了弥合文学雅与俗、科与文等圈层裂隙的重要文学力量。

当然，现有科幻小说的新青春叙事也存在不少问题。最明显的问题有二。一是概念驱动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作家们努力进入人物的意识和情感内部，用具身性经验来表现成长的转变，但这样的探索仍往往难以摆脱预设框架的束缚。一些作品在人物的成长、主体性的建构与呈现等方面，仍存在印证理念的痕迹。如何平衡好概念、想象与现实的关系，摹写出个体成长遭遇科技突变时，生命体验的混沌与偶然，是作家们深化科技时代人学思考的着力点所在。二是诗学精神的分化与降格。作家们多聚力于现实问题与星辰大海这两个科幻想象极点的某一端，少有像《银河英雄传说》《地海传奇》那样用青年人的冒险豪情与社会、自我身份确认，构建起熔宇宙尺度与人性微光于一炉的诗学精神。而这样的诗学精神，恰是科幻这一文类最独特的诗意所在。如何解决上述成长中的不足，既是当下科幻青春叙事面临的问题，也是未来中国科幻创作迈向更高峰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技术想象及其问题研究”(23BZW16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曦)

Adolescent Narratives and the Poetic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ZHAN Ling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has traversed a narrative trajectory from the nascent childhood toward a polyphonic adolescence. Throughout subsequent eras, these adolescent-centered narratives reveal both sharply delineated generational inflections and an evocative poetic resonance. In summary, the evolution of adolescent narratives i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an be delineated in three phases. First, during the two decades following the 1980s, science fiction actively aligned with contemporary social demands and literary mainstreams while focusing on the elaboration of the “New Scientific Youth”—a figure marked by pronounced subjectivity. As popularization and campus-oriented genres increasingly defined the literary marketplace, grandiose narratives gradually receded. In the 1990s, many writers emphasized the pursuit of pure emotion and romantic innocence when portraying the “New Scientific Youth”. Second, from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o the present, coming-of-age narratives in science fiction shifted from depicting protagonists learning to resist adversity and endure existential rupture to illust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inner listening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quotidian experience. This shift reflects authors’ deepening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and constitutes a shift from antagonistic conflict toward holistic coexistence. Third, the “New Scientific Youth”, envisaged as an individual whose identity is anchored in communal belonging, has emerged as an ethical paradigm through which contemporary writers reconceptualize the nexu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the nation, and the global order. Adolescent narratives i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have not only registered with striking acuit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a 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society but have also persistently innovated in the domains of subject formation, affective structuring, and ethical orientation. By virtue of their singular poetic sensibility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hese narratives provide an indispensable lens for interrog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evolving contours of the national zeitgeist. At the same time, they present persistent challenges—such as concept-driven storytelling and a comparatively attenuated poetic dimension—that warrant careful scholarly reflection.

Key words: science fiction, adolescent narratives, poetic spirit, coming-of-age narratives,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